
贵州碑刻文献研究的新视野、新范式

——兼论兴义、遵义碑刻文献的保护与传承

龙仕平¹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出土文献及近代文书研究中心,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视野是指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研究材料产生的拓展和关怀,从而获得新的看法和观点等;范式是指在研究过程中所遵循的某种规范和所体现出的共同特征,包括研究视角、基本线索、主体框架和主要方法等。将新的视野和范式用至贵州碑刻文献研究,可以弥补旧有范式诸多不足与缺或,实现全面、精确分析碑刻材料,核准碑刻文献,检讨存在的问题。目前,鉴于对碑刻文献的研究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对碑刻文献学理论和碑刻文献学史的研究亦显匮乏。因此,采用新的视野、新的范式对碑刻文献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关键词】: 碑刻 文献研究 视野 范式

【中图分类号】: K87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3X(2019)04-0103-08

贵州历史悠久,民风古朴,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红色革命优良传统。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灿烂的文化,产生了诸多的历史文献,尤其是其地下碑刻文献遍布全省各地。除摩崖石刻外,拥有的碑刻文献更是丰富,有记事碑、晓谕碑、契约碑、界碑、修路建桥碑、少数民族文字碑、乡规民约碑、历代名人名物碑、宗教碑、红色革命纪念碑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历代职官、古代地理、民族融合、人口迁移、姓氏名号、世系谱牒、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天文历法、宗教信仰等广泛的领域,几乎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可谓碑种繁多、文体样式基本齐备,有着浓墨重彩、得天独厚的地下碑刻文献资源,实为国内之罕见。众所周知,“碑刻文献作为重要的‘同时文献’,被誉为‘刻在石头上的历史’,具有独特功能和重要研究价值。”^[1]

贵州对其碑刻文献的保护与传承,各地山不惜宝、尽显其功,业已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域场,亦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果,但与国内其他相较成熟的碑刻文献研究相比,其仍然面临诸多困惑,尤其是亟需引入新的方法论资源和分析理论框架的建构。这种“新的方法论资源的引入”就是“新视野”这一新发展理念提出;“分析理论框架的建构”就是“新范式”这一新发展理念的实践。习近平指出:“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辩证法的运用;新发展理念的实践,离不开辩证法的指导。”^[2]这一认识和定位,是推进贵州碑刻文献全面研究的科学基石。贵州的碑刻文献研究,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稳妥地步入新视野、产生新范式,将会迎来更为广阔的研究前景。

一、对各地现有几种碑刻文献在研究方法上的评述与反思

“研究视野”与“研究范式”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研究视野”是指对“研究材料”在时间和空间上产生的拓展和关怀,从而获得新的看法和观点等,是产生“研究范式”最重要的基础之一;“研究范式”是指对“研究材料”在研究过程中所遵

¹作者简介:龙仕平(1968—),男,湖南凤凰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简帛、碑刻出土文字及文献研究。

循的某种规范和所体现出的共同特征,包括研究视角、基本线索、主体框架和主要方法等,是“研究视野”的具体扩展和“再升华”。当下贵州地方碑刻文献研究方式繁多,充分展现了各地方碑刻文献存现情况,但视角方法趋同,刊书形式单一,主要表现在历史资料汇编范式、文化旅游导读范式、文物古迹集萃范式等三种范式类型上;均以类同的视角对碑刻文献进行综述或概说,难以展现贵州碑刻文献内部各元素的个体独特性,“碑刻文献品味”肤浅,尚存在若干不足。

(一)历史资料汇编范式

历史资料汇编范式以碑刻文献题目为线索,以综合其碑刻内容为文本基础的汇编模式。这种范式多以时间为序,按碑刻文献先后出现顺序排列,内容相当简略,类似于大事记,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不是很大,碑刻文献的价值未能得到全面深入发掘和充分利用。作为碑刻文献研究本应对其载体外部形制和内部制度两方面进行研究:一是对碑刻文献载体的外部形制研究。前人着录金石,要绘其形制。宋《宣和博古图》^[3]既以图描其形,又以文述其状,并逐录铭文。碑刻图形则以宋洪适《隶续》首开其例,绘制了几通碑,没有独立成书,内容显得单薄。直到清代,牛运震《金石图》出,才有专书面世。

每一碑都图绘形制,描摹款式,详记尺寸。又如刘海喜《三巴耆古志》《长安获古篇》先画碑石图形,然后释文,最后跋尾考辨,刻工精细,惟妙惟肖。贵州碑刻文献载体,其外形多样,有扁方形、有四面柱形、有六面或八面棱形、有圆形、有鼓形、有横而广者、有直而高者。不过,碑成定制之后,其外形相对固定下来,以扁方形为主,只是碑头或方形、或圆形、或半圆形而已。同时,贵州碑刻外形有一个渐进演化过程,碑石不仅外形规整,精心制作,底纹、图案、边框、界格都有讲究,而且形制也趋于固定,只是大小尺寸没有统一规格,可以随石取形、随形制作。唐代以后,墓碑的大小尺寸开始有明确规定,根据官品大小而不同,封建等级制度在碑石上开始反映出来。

二是对碑刻文献载体的内部制度进行研究。一通完整的碑石,不论大小,不论外部样式如何,其内部制度都有特定的组成成分,有相对固定的内在规律,打造碑石,撰写碑文一般都会按式制作。当然,碑版因时、因地、因制作对象不同,或者因功能不同,会有一些改变,可以增添或者省略一些成分。至于每部分的式样、内容,既有大致相似的规矩,又允许各具特色,表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的特征。一般碑刻文献载体内部制度包括碑额(首题)、碑阴、碑阳、碑侧、碑座、碑晕、碑穿、碑末题文等几部分。这种历史资料汇编范式既不能将碑刻文献载体的外部形制反映出来,也不能将碑刻文献载体的内部制度包容进来,纯属简易的资料汇编,这种范式占据了贵州碑刻文献研究的主要形式。

(二)文化旅游导读范式

文化旅游导读范式以文化旅游为目的,突出碑刻文献中的重点部分,而忽略其他次要部分的一种编辑模式。贵州很多地区都编辑有这种范式。这种范式最大的优点是浅显、明了、容易记忆和辨识。一般游客无论你有没有碑刻文献知识,通过这种范式的介绍,此地有哪些文物,有哪些石碑,立刻一目了然。兴义市推出了文化旅游丛书第一辑,即《兴义史话》《百年永康》《多姿多彩的贵州民族婚俗》《兴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是外地游客了解兴义历史文化的窗口,大大地提高了兴义市的美誉度。

尤其是兴义市对册亨县弼佑乡秧佑村村规民约碑的保护、传承和宣传非常到位,已经编进文化旅游册子和宣传墙。据考证,秧佑村有一个立于同治六年(1867年)的“敬碑亭”,亭里有一通高1.5米、宽1米的石碑,石碑上刻着八句话:“一、不准赌博贪婪,诱惑孺子。二、不准窝贼招匪,致偷设害。三、不准勾引刁棍,平空敲磕。四、不准互唆词讼,波害良家。五、不准诱淫人妻,活夺拐带。六、不准偷盗竹木,争夺田地。七、不准偷鸡盗狗,折瓜偷笋。八、不准恃尊凌卑,凶行磕索。”这个石碑上刻着的“八不准”,其实就是“寨规”。

据说,一百多年过去,当地村民还沿袭着老祖宗制定的规矩,淳朴的民风,堪称古人版“八耻”。据公安系统统计,该村自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又如遵义市务川县镇南镇桃符村立有一块禁杀耕牛石碑。碑文为:“县正堂万示谕,严禁宰杀耕牛及店铺招买牛肉,如违,休怪禀官受累,特立此碑,永达肃戒。清道光二十六年冬月吉日立。”类似于这种图文并茂的文化旅游

导读范式,贵州各地区均有,只是兴义、遵义两市在这方面做得尤为突出。

(三)文物古迹集萃范式

文物古迹集萃范式以文化遗产相珠联,利用文化景观和文化线路齐头并进的一种编辑模式。这种范式一般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物、历史名镇、民族村落及民族纪念性活动场所等,内容上取舍于各县志、通志、府志以及各类考古资料。如《兴义风物之文物古迹》一书,图文并茂,文字简洁,具有工具书性质;《兴义文史资料解读》绝大部分资料就是首次公开出版,一些碑刻文献是近年来文物部门的新发现,点校、翻译、解读这些史料更是第一次,它可以视为兴义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资料集;《石头记忆》一书从典型的喀斯特石头这一特殊角度,采用新的视角对古桥、石牌坊、古道、古墓碑等进行解读,具有浓厚的科普历史文化的成分。

这三本书从中映射出作者对兴义历史文化、民风民俗、自然风光的观察体验,饱含人文情怀,被称为“兴义”的一张名片,一点也不谬誉。但作为碑刻文献来讲,这样的选集方式,不能囊括全部,对全面挖掘碑刻文献的深度来说尚显浅疏。例如,每一通碑里面异体字、俗字的处理以及疑难词的释读、文体赏析等等问题,都非常普遍。如果这些问题不妥善解决,那么,对碑刻文献的保护与传承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空话。碑刻文献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必须要获得全面的探究和保护。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曾作出了这样的基本判断:“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神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3]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对碑刻文献要充分挖掘其“精神实质”,不能浮于表面现象,要将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展现出来,利用专业知识对碑刻文献进行条分缕析的深入探究,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创造性转化为创新性发展。

针对上述三种范式的内涵及特点,要合理取舍、批评地对待与“扬弃”。三者均建立在不同的目的之上,历史资料汇编范式是以资料收集为主要目的,按时间编排,线索比较清晰,内容简洁、明了。文化旅游导读范式其目的性非常强,针对性地面对盘活旅游资源,做大、做强旅游这篇“大文章”,直接带来经济效益。如《遵义文物古迹介绍》分别介绍遵义会议会址、湘山寺、美酒河巨幅摩崖石刻、三河青龙寺、茅台渡口纪念碑等,极具吸引力,带有很强烈的红色旅游文化印记。文物古迹集萃范式以阐述文化遗产为目的。

如兴义市把“鱼龙碑刻群”与“万峰林”有机联系起来,再与古老的布依族民族的民俗民风相辉映,整个画面整齐划一,精美绝伦,充分凸显其丰富的历史文化特质。鱼龙碑刻群包括荣禄宫建庙碑、鱼龙拒控碑、社祭社产碑、鱼龙四棱碑等,分别记叙了布依族历史、风土人情、乡规民约、山川风物、民俗活动的历史,是研究布依族历史沿革不可或缺的、弥足珍贵的资料;其中荣禄宫是布依族和汉族相融合的宗教建筑,对研究布依族发展史和地方宗教发展史,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发展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文物古迹集萃范式仅仅是在已有概念之上进行文物古迹的选取,稍有断章取义之嫌。对以上三种范式的评述和思考,使我们有必要在借鉴已有的理论体系和解释框架的基础上,探求新的视野,建构新的范式,对贵州碑刻文献进行系统、全面、精准研究。

二、对贵州碑刻文献研究的新视野、新范式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里曾著录秦刻石五通,被学界公认为金石学上的草创;但真正意义的金石学则开始于宋代,主要体现在编写目录,撰写跋尾,侧重于碑款介绍、对石刻的出土、流传情况及相关历史考证作简要介绍等。目前贵州碑刻文献研究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材料散碎、原始,全面搜集、整理不够;二是研究缺乏系统性、科学性;三是对碑刻文献学理论和碑刻文献学史的研究不够。鉴于此,对贵州碑刻文献研究,当下要从如下两方面着手:

(一) 碑刻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工作

贵州历代已发现碑刻的具体数量,至今还没有确切的数量统计。各种碑刻文献的现存情形,分布状况,亦无比较详细的掌握。情况不明,家底不清,亟待进行全面搜集,科学整理。搜集与整理工作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将视野定位在全省的高度上,摒弃地区、地方对碑刻文献保护主义做法,统一行动,统一范畴,统一要求,尽量搜毕全省碑刻文献资料。搜集碑刻文献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程,搜集范围广、内容多、形式多样,特别是对部分涉及贵州人或事的域外碑的搜集更为艰难。

一般省内搜集主要包括对原碑原拓、现碑现拓等一手资料、音像资料和各种史书资料的收集,均须亲赴现场进行田野调查,并对现碑刻进行材质分析、泐失程度分析、尺寸丈量、经纬度确定以及各项综合测评等。学会合理利用高科技手段的支持,在数字环境下,信息(information)、数据(data)、档案(document、record、archive)三者显得尤为重要。把搜集来的每一通碑进行“建档立户”,并将所有信息根据“数据”输入电脑,建立文档或档案。

对碑刻文献的整理工作,主要落实在如下四个方面:(1)编写总目提要。在把搜集来的碑刻文献信息全部输入电脑的基础上,根据文档编辑总目提要。总目提要按县或地区编写,包括如下完整内容:序号、拓片来源、拓片题名、其他题名、撰人、刻石时间、出土时间、现藏地点、书体、原石尺寸、拓片尺寸、拓片描述、题跋印记、其他情况、校注册页、备注等,完成《贵州碑刻文献总目提要》的编撰工作。

(2)制作石刻图录。从已公布的碑刻文献材料来看,全省制作图录较少,大量的石刻或拓片仅存于各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甚至有些经年太久业已腐烂。可以学习整理甲骨文、金文、简帛、敦煌写卷的方式方法,利用现代技术,制作成尽可能清晰的、便于识读的图录,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工程。

(3)精准释文。根据制作好的图录、拓片与原物,进行碑刻文献的释读。准确地释读,离不开扎实的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功底,以及多方面知识的储备。碑刻文献字体多样,或楷书、或隶书、或篆书、或行书、或草书,而且还存在大量异体字、俗讹字,这样给释读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再者,读碑还需要广泛涉猎其他知识,包括文史知识、考古知识、哲学知识、法律知识、社会学知识、医学知识、甚至数学、军事学知识等,尤其在内容上多涉及古代社会生活、礼乐制度、民俗民风较多。碑刻文字多用俚语、典故,对其内容的正确理解与把握也显得非常艰难,但是只有准确的释文,才是整理碑刻文献并使之被科学利用的前提。对已有的释文,可以对照图版,参考诸家录文、题跋、碑别字专书,以及其他相关专题研究成果,进行精心校勘。只有认真核对,做出精校本,这样整理出来的碑刻文献才真正具有使用的价值。

(4)科学注释。碑刻文献记载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容易成为阅读的拦路虎;铭刻绝大多数用文言写成,且大都用典,形成诸多理解障碍。即使是白话碑,也是古代白话,有的词句理解起来难度甚于文言;再加上文字假借、俗讹、同形异词、异形同词,以及文献的残泐阙脱,又给阅读增添了诸多难度。因此,有必要对碑志中的疑难字句、典故等加以注释,扫除障碍,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熟”文献,以增强利用率。

(二) 碑刻文献的研究工作

搜集碑刻文献的目的在于用来研究,首先要确定研究的内容、方法、对象、手段以及意义,结合前修时贤的研究成果作客观评价,方便进一步研究工作的具体展开。从碑刻文献本体出发,对碑刻文献的研究重点如下:

1. 对碑刻文献的本体进行研究

主要从三方面进行:首先,对贵州碑刻的形制及其分类(含碑刻类别源流)进行研究,包括碑碣、石阙、摩崖、墓志、经幢、佛龕铭、石柱名刻、造像题记、石刻画像题字等,还有枢铭、地崩、镇墓文、告地状、墓石诏书、诰命符等幽埋石刻以及一些其他

散乱的宗教铭文等。其次,对碑刻文献的字体、内容进行研究。对原有碑刻文字字体进行研究,尤其重视对碑刻中出现异体字、生难字词的研究。

对其内容研究包括历史、地理、人名、地名、职官、民俗、民情研究等。如贵州“乡规民约碑”特别多。根据资料统计考证,自唐至民国,清水江流域历代立下“契约碑”共达100余通。这些碑刻的内容使贵州成了一部“史料汇编”,可以形成包括政治史料汇编、经济史料汇编、文化教育史料汇编、人文精神史料汇编等在内的历史资料。最后,对碑刻书法价值、史料价值以及宗教文化研究。

贵州碑刻文献书法价值极高,如兴义用汉字译布依族语音的“查氏宗祠碑”在贵州独树一帜;“学书枝言碑”具有重要的书法理论价值和技法指导意义,填补了贵州近代书法理论史的一段空白;又如贵州遵义会议纪念碑的题词、飞夺泸定桥题词、红军长征路上的题字等都具有相当高的书法价值。贵州碑刻史料价值也很高,李斌《论明清以来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碑刻的分类、内容与学书价值》、秦秀强《清水江下游苗侗地区碑刻文化调查-以天柱县为例》等对清水江下游侗族地区碑刻进行搜集和整理,其史料价值极不可估量,正如欧阳大霖说:“侗族地区的碑刻文献是侗族社会发展的历史记录,记录了丰富的历史事件,涵盖了历代封建王朝对侗族地区的政策以及贵州地区农林经济、民俗文化、传统教育、环境保护、民间法规诸多领域。”^[4]

贵州碑刻文献的宗教文化亦非常丰富,佛教碑黔东如梵净山系列碑;黔西如平坝山伍龙寺、织金四庵、四寺碑;黔中如弘福寺、黔明寺、觉园禅院碑;黔北如湘山寺、桃溪寺、大觉寺碑等。道教碑则更多,龙平久指出:如明成化贵州巡抚陈宜(俨)《东岳庙碑记》、清康熙贵州巡抚田雯《重修武侯祠碑记》,瓮安县《关帝庙碑记》,思南县《重建川神祠并后楼碑记》,毕节市《诸葛碑》等^[5]。这些丰富的宗教碑刻文献资料都值得认真品味和揣摩,对本体的深入研究是所有后续工作开展的前提。

2. 对碑刻文献进行专题、专项研究

根据碑刻文献的内容和特点,可以分为历史研究、经学研究、书法研究、宗教研究、文学研究、语言文字研究、科学技术史研究、艺术研究、军事研究、经济研究等专题、专项进行立体化研究,以凸显贵州碑刻文献的应用价值,实现各学科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趋于科学、研究手段更加先进、学科分类更加细密以及研究思路更加开放的新局面。除此之外,依据贵州碑刻文献的特点,可以运用新视野、新范式对贵州碑刻文献研究作若干思考。

(1) 围绕清水江流域做文章

清水江流域是苗侗族人民生活栖居之地,除了保存大量清水江写本文书外,也存现许多碑刻文献;这些碑刻文献有反映土司历史的,如黎平县地坪《林肇元严禁土司勒收兵谷告示》以及兴义《鱼龙拒控碑》;有反映民事诉讼案件的,如锦屏高柳《永定规》碑;有反映革除“姑舅表婚”等陈风陋习的,如锦屏启蒙《因时制宜》碑;有反映关于丧葬习俗改良的,如江庆云乡《乡例碑》;有反映与人为善、乐善好施的,如从江县《禁条碑记》;有反映禁止乱砍滥伐、环保意识的,如黎平南泉山寺《公议禁止》碑以及天柱县瓮处镇雅地村的《禁伐碑》;有反映民间法规的,如从江高增《寨款碑》等,此外还有《始修桥路碑记》《次修桥路碑记》《终修桥路碑记》《修渡碑记》《修井路碑记》等修路、修桥碑。

尤其是对“土司历史”文献碑的研究意义重大,由于土司制度源于秦汉时期的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所实行的羁縻政策,而这种羁縻政策,是秉承了“修教齐政、因俗而治”的传统理念,与地方少数民族谋求利益平衡及共同发展,从而实现大一统国家稳定与文化多样性传承的民族生存和社会管理的重要政治智慧。对土司历史的全面性研究,有利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政治智慧,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及未来多民族共同繁荣、文化多样性的有效维护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 围绕红色革命遗址做文章

众所周知,贵州省是中国革命的福地,是中国工农红军曾经战斗的地方,全省 60 余个县、市留下不少红军的遗迹遗物;大量红军的战斗遗址、指挥部旧址、避敌旧址、卫生部旧址、重要会议遗址、地下党暴动旧址、交通站旧址、红军标语、烈士陵园、红军坟墓、烈士殉难处、将军墓志铭等都被保留了下来,很多地方建有纪念碑、纪念坊、墓碑、胜利坊等。

尤其是黎平会议遗址、遵义会议遗址、四渡赤水遗址、息峰集中营遗址等显得非常重要。1935 年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通过碑刻文献可以从中找到传世文献里没有记载的信息;还有多次大的战役,如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娄山关战役等必然会留下诸多信息。从事红色碑刻文献研究,可以为对公众进行红色革命教育找到范本和依据,同时,可以大量投入资金对革命遗址进行维护和保护,并搞好当地各方面资源的整合,实现红色旅游、兴省安邦的目的。

(3) 围绕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做文章

贵州有 49 个少数民族,拥有夜郎文化⁽¹⁾、屯堡文化⁽²⁾、阴阳文化、酒文化、宗教文化、水西文化⁽³⁾、饮食文化等历史文化形式,形成了最为典型的贵州文化体系,有着突出的比较优势。其中“夜郎文化”“酒文化”“水西文化”在贵州最为典型。夜郎文化中的许多习俗如生殖崇拜、祖先崇拜、鬼灵崇拜及夜郎人的居室建筑形式等,都一直影响到今天人们的生活。如巢居、山处、“干栏”这种居室建筑形式,对布依、侗、水等族人的民居建筑特色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酒文化”,贵州是盛产国酒“茅台”故乡,民间酒文化的内涵丰富,敬神祭祀有礼制,长幼尊卑有法度,东南西北有酒俗,上下左右有禁忌。还有各种酒器,如酿酒的瓮、蒸酒的甑、盛酒的桶、舀酒的勺、吸酒的管、斟酒的壶等。另外,酒旗、酒歌、酒令、酒举、酒礼、酒会等都有讲究,许多都有碑刻文献的记载,值得研究。“水西文化”中深明大义的彝族首领济火,为诸葛亮南征献粮开道,受封创建了部落之邦——罗甸王国,这段历史必然有文献记录,也是值得深究的。

贵州的民族如苗、布依、侗、回、彝、水、瑶等几个少数民族,在语言、信仰、节日、习俗、饮食、婚俗、祭祀、歌舞等方面,各有特点。贵州古彝文碑王明贵统计有 490 余通,主要分布黔西北彝族聚居区^[6]。如《李妮脚夫墓碑》《范门龙氏墓碑》《爵布墓碑》《大渡河建石桥记碑》(分彝文、汉文两通)等。此外,兴义市发现唯一一通彝文碑,即《发玉彝文碑》,又名财宝山郭公墓,全部用彝文写成。贵州水族主要分布在三都水族自治县,不仅有自己的语言,而且有自己的文字。水族人民明清以前的石板墓上就出现了古朴的人物、花草、虫鸟、奇兽等雕刻图案,清乾隆以来,水族人民更注重于墓碑的造型和图案的装饰等。

(4) 围绕摩崖石刻、古建筑做文章

摩崖,又作“磨崖”,是刻写在山崖石壁上面的诗文、题字以及造像等石刻的通称。依靠天然石壁,就地选材,因山随势,不必采石,也不必运输,只要在石壁上磨出一块平面,便可镌刻出各种摩崖铭文,显得十分便利。摩崖的保存,一般都比较长久。历史上有记录的最早摩崖是《岫嵎铭》,因传说在衡山的祝融峰上,故又称“祝融峰铭”。其内容是颂扬夏禹的治水功绩,文字诡谲怪异。红岩摩崖,在贵州关岭县南断桥乡龙爪树晒甲山。

明徐霞客在一片赭色悬崖峭壁上发现。上面有诡奇怪异符号 40 多个,一般认为是文字,字序参差不齐,字径大小不一,大者在 100 厘米以上,小者 20-30 厘米。远望石赤字青,仿佛大书深刻,近察却并没有刀刻斧凿痕迹。符号构形怪异,难以释读,人称“红岩天书”。明嘉靖年间,邵元喜作《红岩诗》,是现存最早的记载。清代中叶,开始有拓本、摹本问世。随后有释读和研究成果刊行,于是蜚声海外。目前学术界对这些符号的认识存在很大分歧。

可大分为二:一派认为不是文字,而是天然石花。一派认为是文字,但又有不同看法,清代莫友芝认为是“三危禹迹”,邹汉勋认为是“殷高纪功”,赵之谦认为是“苗文古书”,其他还有“诸葛图谱”,“彝文先声”等说法,均难确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一些新见解,如董洪认为是“夜郎卦经”,刘乐一认为是描写宫廷内乱,可能是明代建文帝后裔或随员所作,这些说法都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王正贤、王正尧有《贵州红岩古迹研究》,可供参考。

古建筑通常被称为历史上的“活化石”，例如古城衙门、会馆道观、亭台楼阁、寺庙塔幢、桥涵古道、学堂书院、牌坊影壁、古桥、宅地民居、庙宇祠堂、池塘井泉、堤坝渠堰，以及其它古村落和一些还未谋面不可移动的地下文物等，基本都有碑刻文献记载；同时，还有铜钟、铁鼎、玉器、瓷器、木器、竹器、漆器以及古代钱币等特殊载体上也有很多文字记载，均值得搜集整理与研究，对丰富历史文化事实同样具有不容小觑的作用。

三、结语

贵州的碑刻文献，争奇斗艳，异彩纷呈，体式多样，显得尤为珍贵。由于碑刻文献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作为“同时文献”，其真实性强、可信度高、涉及面广。目前，对碑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虽然已经有了比较丰厚的积累和良好的基础，但仍然缺乏新的“视野”，也难以产生新的“范式”。主要表现如下两点：一是难以从地域学视角对贵州石刻文献进行深入阐发、具体分析以及客观评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更深层次认识，以便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二是难以从现代价值观深入挖掘古代民间碑刻文献典籍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及其内涵，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以便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另外，在贵州碑刻文献中少数民族文字碑占有相当的数量和地位，主要包括彝文碑、水文碑。至目前为止，根据实地调查发现发现的彝文碑刻多达 400 余通，发现的水文碑刻多达 200 余通。这些少数民族碑刻文献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民俗价值以及艺术研究价值等，属于“濒危古籍文献”，必须进行抢救、保护和修复。

只有这样，才能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甚至为地方旅游作贡献。因此，我们要投以新的视野、新的范式，对贵州碑刻文献分专题、专项进行深入考证，以达补史之阙，纠史之误，实现全面掌握碑刻文献之目标，丰富我国的历史文化建设内容。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碑刻材料和研究方法不断得到拓展，使研究的成果不断后出转精，全面揭示出碑刻的真实文化体系和文献价值。

参考文献：

- [1]毛远明. 碑刻文献整理的研究回顾与前瞻[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3-4.
- [2]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211.
- [3]荀况撰, 杨倞注. 宋本荀子(全四册)[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226.
- [4]欧阳大霖. 试论贵州侗族地区碑刻古籍的文献价值[J].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4(6):5-8.
- [5]龙平久. 贵州道教文化的旅游价值[N]. 贵州民族报, 2007-11-22.
- [6]王明贵. 贵州古彝文碑[J]. 民族艺术, 1997(4):139-143.

注释：

1 “夜郎文化”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已提出，它是贵州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当代贵州文化的重要基因或源头，它是夜郎时期的各民族及其尔后居住在夜郎故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也是夜郎与周边各地区相互影响的结果。

2 安顺屯堡文化，是贵州特有的一种文化资源。这是一段关于明朝移民的历史记忆，一种独特的汉族文化现象。它既保留了先祖的文化传统，又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了独特的地域文明。屯堡是汉族文化的“活化石”，是世界上最后的明代古村。

3 “水西文化”就是在乌江鸭池河以西发展起来的文化,属于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蜀汉至清初的 1400 多年间,毕节属水西,归彝族世袭统治,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水西文明。丰富的彝学文典,使水西成了中国彝文化研究中心。